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历史回顾】	军队与文革（上）	余汝信
【拒绝遗忘】	4·22聚会历难记	孙怒涛
【劫后反思】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刘索拉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历史回顾】

军队与文革（上）

· 余汝信 ·

第一部分 军队与文革进程关系述略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1929年12月为古田会议所写的决议案中，早就明确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时代的人民解放军，历来绝非单纯地被视为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相反，更多的，是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须臾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文革十年，尤为甚之。

本讲座第一部分，拟将人民解放军在文革十年间所走过的历程作一简要叙述，并试图揭示中共的这一军事力量与整个文革进程息息相关的紧密连系。为叙述方便，依据十年间（并上溯至文革前一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负责人两个层面，将此一历程分为若干阶段。

一、文革前夕

本时段为1965年1月至12月一整年。

1965年初，人民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447万。这一支全球人数最多，绝对服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指挥的庞大武装力量，是毛泽东敢于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力量，最根本保证。

1965年，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声誉日隆。军队政治工作经验被广泛应用到地方，如毛泽东早在1963年12月所言，“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自1964年初至

1966年文革前夕，从解放军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建立的地方政治机构工作，先后设立了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农林、财贸、基本建设、外事和文教政治部，在国务院各部委、直属单位亦先后设立了政治部。1965年2月，调南京军区第二政委萧望东任国务院文化部第一副部长（部长陆定一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改组、调整文化部领导班子。“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具有文革中“三支两军”的雏形。

这一年，已经实行了十年之久的军衔制度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与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作为“防止修正主义”的措施，人民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度。这一倒退性做法，使军队正规化建设遭受重创，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这一年，随着毛泽东对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表现愈见不满，对党内第六号人物、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愈加寄以厚望。1月初，林彪取代党内第五号人物陈云，成为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1月底，林彪的艺术形象首次出现在纪念邮票上，这是建政后除毛泽东、朱德外其他政治局常委都未有过的殊荣。2月中，毛泽东表扬林彪：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炙手可热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指为觊觎军内更高权力的“野心家”，遭到毛泽东、林彪的合力清洗。12月8日—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有61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

罗瑞卿作风强悍，能力过人，惟性格上亦有明显缺陷，一为独断专行，惯于揽权，二为不注意团结同志，易得罪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揽权”被放大为“有野心”，成为政治品质要害问题。

上海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 二、毛一林一（周）一叶、萧、杨“三驾马车”时期

本时段由1966年1月至1967年上半年，约一年半时间。

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毛秉承建政以来一贯作风，对军队大权（包括但不限于作战行动、一定级别以上部队调动、一定级别以上人事任免等）一人独揽。

林彪名义上以军委第一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惟自1967年1月军队介入地方文革后，具体的“三支两军”任务往往是周恩来以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人身份布置的。文革时期，周恩来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职务，惟其以历史上形成的威望，对军队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忽视。由于周恩来的作用，林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是当甩手掌柜。

上海会议后，1965年12月29日，杨成武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1月，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增补为军委副主席。同年5月，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原毛泽东—林彪—（周）—罗瑞卿（负责处理军委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军委秘书长）的军委领导架构，被毛一林一（周）—叶剑英、萧华（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副秘书长）、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三驾马车”所替代。

进入1966年，罗瑞卿问题升温。3月4日—4月8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小组会议，以“彻底弄清罗瑞卿的问题”。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为罗问题定调称：“罗担负的职务很多、很大。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秘书长等等，掌握了军事大权。军队是党的命脉，无产阶级的命脉，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在中央正式决定开展文化大革命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曾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等军队系统负责人谈话，将毛要与刘少奇摊牌的紧急要况及时通报他们，告诫他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全会期间，政治局常委会改组，林彪取代刘少奇取得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并被戴上毛“亲密战友”的桂冠。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大大加强了现役军队领导人在政治局中的份量，充分体现了毛依靠军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至于军内文革，原来的设想是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和组织的整顿，彻底批判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和言论。此一计划三个月后发生变化。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林彪就军以上机关文革问题发表指示称，“部队要根据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决定，军级机关、军区、军兵种机关和总部机关及各院校，都要进行一次大整机关。……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民主，轰轰烈烈的点火大烧一阵。要认真地、切实地搞一下，不是走过场（师以下部队按军委总政指示，搞正面教育）。要全面审查干部，破‘四旧’，立‘四新’，精简机关。大整官僚机构，大整官僚作风。”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讲了相同意思的话。8月16日，第54次军委常委会议确定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九月份开始，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惟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一时间上的设想很快就被突破。

1966年9月，毛泽东同意将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的有关问题在高级干部中打招呼。1966年底至1967年1月初，贺龙问题呈公开化并于1月中旬失去人身自由。1967年9月，毛同意对贺龙立案审查。贺在关押状态下于1969年6月9日病逝。

1966年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林彪指示起草的《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联和调查。”自此，全军院校十万青年军人解除束缚，汇成汹涌澎湃的造反洪流，其巨大的冲击能量波及军内外。

1966年底，在文革狂潮冲击之下，中共原有的地方党政权力架构根基已然动摇。翌年1月全国性的夺权风暴，使各地党政权力架构陷入更深层次的分崩离析局面，各地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不得不动用受冲击最小而相对而言尚表现为强而有力的、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军队，去填补地方党政机构坍塌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从而承担稳定局势的重任。

1967年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正式介入地方文革。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明确了军队在文革中“三支两军”的基本任务。惟“三支两军”的作用并非是平行的，“三支”中最重要者是支左，“两军”中重点是军管。

文革期间，军队介入地方事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就广度而言，以1967年初最具战斗力的陆军机动部队（野战军）31个军、1个军级指挥部为例，沈阳军区陆军八个军“三支两军”负责范围为：第十六军负责吉林长春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第二十三军负责黑龙江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及鹤岗、鸡西、双鸭山、伊春、牙克石等地区；第三十八军负责吉林通化地区；第三十九军负责辽宁鞍山市、营口市及海城、复县、新金、盖县、盘锦等地区；四十军负责辽宁锦州、朝阳、阜新地区；四十六军负责吉林省吉林、延边地区；五十军负责辽宁丹东地区；六十四军负责辽宁本溪、抚顺地区。北京军区陆军六个军：第二十一军负责山西省；第二十四军负责河北唐山地区；第六十三军负责河北石家庄地区；第六十五军负责河北张家口地区；第六十六军负责天津市；第六十九军和河北省军区共同负责河北保定地区。济南军区陆军三个军：第二十六军负责山东烟台地区；第六十七军负责山东青岛地区；第六十八军负责江苏徐海地区和山东临沂地区。南京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十二军负责江苏苏北地区；第二十军负责浙江省除舟山群岛以外地区；第二十七军负责江苏苏州、镇江、常州、无锡地区；第六十军负责江苏南京地区。福州军区陆军两个军、一个指挥部：第二十八军负责福建晋江地区；第三十一军负责福建厦门、龙溪地区；闽北指挥部负责福建福安地区。广州军区陆军四个军：第四十一军负责广东汕头地区；第四十二军负责广东惠阳地区；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省和广西桂林地区；第五十五军负责广东湛江地区和广西柳州地区。武汉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一军负责河南开封地区。昆明军区陆军两个军：第十三军负责云南滇南地区；第十四军负责云南滇西地区。成都军区陆军一个军：第五十四军负责四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

1967年2月，第三十八军调防至河北保定地区，第二十一军调防至陕西省，第六十九军调防至山西省，调防后的三个军各自负责所在地区的“三支两军”。6月，第五十军调防至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地区，负责此三个地区的“三支两军”。7月，第十二军根据中央决定入皖支左。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赴赣支左。8月，第二十军代行浙江省军区职能。此外，年内各野战军的“三支两军”地区范围多有所扩展。

1967年1月后展开的“军事管制”，是在原有的地方权力架构处于坍塌状态之下的一种非常措施。根据军管对象的不同情况，军管的形式分为三种：一为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二为建立军管小组，三为派出军事代表。

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例，1967年3月至5月间，由中央批准实施军管、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有8个，按先后顺序为江苏、广东、浙江、云南、安徽、青海、福建、西藏，占总数的28%。8个省、自治区军管会中，由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担任主任的占了大头共有5个，大军区副司令员任主任的2个，省军区政委任主任的1个。此后，省、市、自治区一级再未实行军管。

1967年，国务院共有正部（委）级机构48个，除国防部为虚设，公安部、文化部未实行军管外，实行军管的部（委）共45个。其中国防工业6个部（第二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初期由军事科学院、空军和海军各负责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1968年3月后军事科学院人员大部撤出，继由空军、海军、总后和总参接替其军管任务。国防工业口以外的部（委）共39个，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8个，军管小组3个，派出军事代表的18个。担任

部（委）军管机构领导或军事代表的军方派遣人员，级别相差甚大，最高级别者为各军兵种或大军区副职，最低为团级干部。

国务院21个直属机构中，除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已由空军接管，国家海洋局由海军代管列入军队序列，国家档案局、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情况未详外，其余机构及国务院秘书厅共18个单位全部实行军事管制。其中组成军管会的1个，军管小组4个，派出军事代表13个。

1968年4月至8月间，对中共中央主要工作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分别实行军事管制。中共中央组织部虽未实行军管，但早已于1967年5月派驻由军方组成的业务组以负实际领导责任。

最令人惊诧的是，军事管制的形式竟然延伸至军内单位。1967年4月，军委决定，对大军区级的军队最高学府——高等军事学院实行军事管制，任命原上将、当时已无军内职务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奇涵为军管会主任，曹广化（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为副主任。1968年10月，对军队最高政治首脑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实行了不符常理的军事管制，任命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为军管小组组长，刘江亭（陆军第二十一军副军长）为副组长。

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最重要组成部分，偏于保守，追求稳定为其必然。故而，在介入地方文革之后，大部分军事机关、部队往往倾向于维护旧秩序的保守一派。1967年1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八条”颁布，使军队自以为拿到了对付曾冲击军事机关的军内外造反派的“尚方宝剑”。“军委八条”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惟中央以至毛泽东本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何谓“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谓“右派”，何谓“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制定、公布一个严格的统一的划分标准（事实上也难以有一个客观的划分标准），这就为各地军事机关留下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换言之，划分标准全凭各地军事机关主观地自行掌握。而各地军事机关（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以至人武部）一般来说，与群众组织中所谓“组织成份较纯”、“出身好”、党团员较多的保守或稳健派思想接近，关系天然地较为亲和，这就难免与保守派的对立面造反派、或造反派中稳健一派的对立面激进一派，感情疏离以至产生对立情绪。1月底至3月间，各地普遍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激进派的大小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又以新疆、福建、湖南、内蒙、广东、四川、湖北、江苏等地为甚。

1967年4月6日，又经毛泽东批准发出“军委十条”，对“军委八条”引发的军队对造反派、激进派的无情镇压进行纠偏。“军委十条”规定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任意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概不追究，等等。“军委十条”解救了造反派，却又引发了其对军队及保守派的报复。军队及保守派不服，两派矛盾加剧，武斗频仍。7月，在倾向保守派的武汉军区眼皮底下，发生了武汉地区部分保守派群众与军人围困毛泽东及中央要人居住的东湖客舍，要挟中央改变对武汉地区既定政策的“七二〇事件”。该事件是社会上两派矛盾激化反映到军内的一次总爆发。惟始料不及的是，“七二〇事件”对夜半三更仓皇离开驻地转移到空军机场、打破十年来不乘飞机的惯例、清晨即离汉飞沪的毛思想上巨大的冲击，反而成为一个契机，使毛看到事态演变下去将一发不可收拾的严重性，促成毛一改初衷，将文革的战车骤然改变轨迹，逐步从“乱”走向“治”。

全国范围的武斗最终平息下来，两派纷争走向缓和，经历了年许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军队，尤其是野战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排除在个别地方军队的介入反而加剧了两派矛盾，但总体来说，对于平定大局而言，军队的正面作用远大于负面作用。此外，军队对各地的无政府乱状亦加以压制，典型的如湖南道县事件。1967年7—9月间，道县发生群众性杀害“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及其子女事件，共被杀和被迫自杀4,519人。杀人事件迅速波及全零陵地区其他10个县，造成全区共被杀和自杀9,323人，其中“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2,862人，另致伤残2,146人。8月29日，陆军第四十七军一四〇师炮兵团（代号6950部队）进驻道县，采取措施制止杀人，9月下旬基本得以制止，其他县杀人事件到10月底陆续结束。

在军内，“军委十条”颁布之后，一度受压的军内造反派重新抬头。在大部分驻京军内单位，受萧华、杨成武及年初成立的新军委文革小组实际支持的造反派（“新三军”又称“反三军派”）与受军内实力派支持的保守派（“老三军”即“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形成了势力强弱不一而相互对峙的局面，惟这一局面很快在“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得以打破。毛泽东、林彪表态支持了参加5月13日演出的“老三军”（“演出派”），冲击演出的“新三军”（“冲派”）随即一蹶不振，萧华在“五一三事件”两个多月后也正式宣告倒台。

### 三、毛—林—（周）—杨成武时期

本时段由1967年9月至1968年3月，为期很短，仅有半年时间。毛、林、周的作用与影响力基本与上一时段相同。

1967年8月，由于萧华的倒台，加上叶剑英、徐向前自批判“二月逆流”后在军内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三驾马车”仅余杨成武一人。此时，总政和军委文革小组实际处于瘫痪状态，根据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4人组成军委办事组，9月，又决定增加杨成武为成员，并指定杨为组长，吴为副组长。

军委办事组成立之初，“任务主要负责驻京各机关、部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看着总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要出偏差”。而“各大军区、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负责办理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交办的一些有关具体工作。”

“五一三事件”之后，杨成武的日子亦不好过。1967年9月间，江青曾几次大发脾气，指称原热心为江办事的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杨要“放长线钓大鱼”。年底前，毛泽东在“绝对权威”的问题上又不点名地重重敲打了杨。文革以来位高权重的杨成武实质上存在的“华北山头”倾向引致毛、林及部分军队实力派人物的警惕与不满，最终酿成了1968年3月的“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倒台。

### 四、毛—林—（周）—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时期

本时段由1968年3月至1971年9月，为三年半时间。仔细区分，又可分为两个子时段：1968年3月至1969年4月，为林彪尚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名份时期；1969年4月至1971年9月，林彪已失去此名份。而毛、周的作用与影响力与上两时段相同。

1968年3月25日，“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经毛、林同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成员的新的军委办事组名单。三天后，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周恩来称，“军委常委不要开会了吧？”毛称，“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林彪称，“把它悬空起来。”毛称：叶剑英说过，杨成武是接班人。现在换了黄永胜，你这个黄永胜为什么不可以接班？毛泽东的话里，隐含有以黄代替林主军的意图。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一方面发出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一方面将军队的“支左”方针调整为“支左不支派”，对各派群众组织号称“一碗水端平”，以促进“革命大联合”，促成“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多由军队作主导。到1968年9月，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一批军队高级干部担任了省一级革委会的主要领导职务：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由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由军委常委谢富治担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滕海清担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由江西省军区政委（原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担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由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担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六军政委王淮湘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由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担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二十军兼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担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由陆军第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担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担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担任；云南省革委会主任由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担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由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担任；西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由新疆军区司令员龙金书担任。以上现役军队领导干部共20人，占同级革委会主任人数几近七成。其余原地方领导干部9人，除河北李雪峰、广西韦国清早已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外，1967年5月后，黑龙江潘复生兼任沈阳军区政委，山东王效禹兼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张春桥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山西刘格平、天津解学恭分别兼任北京军区政委，河南刘建勋兼任武汉军区政委，陕西李瑞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

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后，文革发展到“斗、批、改”阶段。在此前后，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这些全国性的以及各地名目繁多的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两年多时间没有消停。这些运动，基本上是由各级革委会尤其是革委会中的军队代表主导，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群众受到无端的猜疑和批判，逼、供、信盛行一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臭名昭著者如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在江苏掀起的规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历时三年多，全省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和立案审查13万多人），死伤6,000人（其中被逼死打死2,540人）。江苏省1957年反右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为13,349人，江苏清查深挖“五一六”运动是反右斗争伤害面的20倍。作为清查“五一六”试点单位的南京大学，全校被打成“五一六”的多达1,560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近三分之一，其中被关押批斗389人，被判刑16人，被迫害致死21人。又如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在内蒙古领导的“挖肃运动”，根据官方不完整的统计，“在全自治区共挖所谓‘内人党’346,220人，刑讯武斗致死16,222人，

致严重伤残 87, 188 人。”惟对内蒙古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滕海清却未有受到应得惩罚，事后且平调至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成员 25 人，其中现役军队领导人 13 人，占 52%（四野系 5 人占 20%）。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军委未设常委，军委办事组部分行使军委常委职权，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组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1969 年 3 月，毛泽东借中苏边境发生的小规模冲突“珍宝岛事件”，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使全国进入紧张的战备时期。

1969 年之前的几年，军队的兵力已呈逐年递增趋势。1969 年为适应战备需要，开始大量组编部队，军队员额持续上升。1969 年间，陆军增加了三个军部（陆军第十一军、第十九军、第二十九军），组建和改建了 30 个陆军师。第二炮兵组建了第五十六基地。总后勤部组建了 20 个基地兵站（行使师级权限）。海军组建了广州、上海、烟台基地（行使军级权限），组建及扩编水警区各 1 个。空军组建了空军第十一、第十二军 2 个军部，组建了 8 个航空兵师，2 个高炮师。

1969 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部队的部署调整。10 月，军委发布命令调整列入战略预备队序列的 13 个军和 17 个技术兵种师的部署，加强了“三北”地区尤其是北京周围的兵力部署，并在战略纵深留置强大的机动兵力。至年底，北京军区达 8 个野战军的兵力，加上沈阳军区 6 个军，兰州军区 2 个军，“三北”地区共有 16 个陆军军，为全国陆军军总数的 44%。

至 1969 年底，全军在编人员增加至 631 万余人，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最高数额，成为中共建政以来军队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期。

1969 年 10 月中旬，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疏散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之后，毛泽东即离京赴武汉，林彪随后疏散至苏州，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留守北京。10 月 17 日，林彪就军队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作出指示。依照这个指示，全军各部队立即行动，当夜即疏散到位。涉及部队约有陆军 90 余个师、520 余个团，海军 430 余艘舰艇，空军 4100 余架飞机。此阶段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处于紧急战备和疏散待战状态，到 1970 年 4 月底稍有缓解。

自 1967 年初始军队以“三支两军”修复地方走资派被打倒后陷于坍塌状态的权力架构，加之 1969 年对苏战备形成的客观情势，使中国的最大部分权力归集于军队，亦使毛泽东对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形成戒心，视其为“尾大不掉”。加之林彪对毛的“不断革命”渐生厌倦，毛有意在激进派文人中另选最能深刻领会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传承者。林彪虽则在中共九大被确立为“接班人”，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惟他的权力不仅未有因此而获得实质性的增加，反而却有被架空的明显迹象。相对于其在党内唯一的副主席的“独一无二”的名份，他在新军委中的位置就显得不那么耀眼——他不过是六位副主席之一，不但没有被予以第一副主席的名份，更未如十年前新军委成立时一样被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0年3月。毛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6月，经毛同意国务院由文革前的90个单位精简为27个单位，各新单位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惟虚设的国防部未有如其他部门般任命负责人。林彪直至此时对外仍沿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名义，在政权体系中地位低于中共第三把手周恩来。周试图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向毛提议解决此一问题，8月，周与陈伯达、康生向毛提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也要一元化，尽管是个形式，但群众热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当然副主席。这样就满足群众愿望。领导嘛，当然是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了。但在国家形式上，是国家元首、副元首。”惟毛有意不予回应，及后在九届二中全会基本通过的宪法草案中，称毛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虽称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但坚持不给予其“副元首”的尊称。

在1970年8、9月间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林为以张春桥（毛心目中的真正传承人）为代表的文革极左派翻脸。庐山会议之后，毛明里狠批陈伯达（并无辜牵连李雪峰、郑维山），实质剑指林彪。毛逼迫军委办事组诸成员为庐山事检讨再检讨，最终目的也是逼迫林彪低头就范，惟林不为所动。整整一年后的1971年8、9月间，已铁心抛弃林的毛到南方“巡视”，发动各地诸侯倒林，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历史上毛的整人手段使林一家（林立衡除外）深生恐惧，令林与妻、子不惜孤注一掷，冒九死求一生，于9月13日00：32在海军山海关机场乘专机强行起飞逃出境外，02：25在蒙古肯特省苏布拉嘎盆地坠毁，机上九人无一生还。

## 五、毛一叶、邓时期

本时段由1971年9月至1976年1月，为四年又四个月时间。叶剑英被毛授权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在此一阶段渐告淡出。

蒙古草原深处的一声巨响，宣告了毛泽东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全破产。毛顷刻间一脚踏入黄昏岁月，他的事业由此从“辉煌”走向破败。“九一三事件”之后，红极一时的被视为林彪一系的军人遭到清查清洗，“批林批孔”持续经年，军队的高、大、上形象黯然失色。

据不完全统计，受林彪事件牵连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达40人之多。林彪事件前，被打倒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达45人。林彪事件至文革结束，受到处分的高级将领又有20人。十位元帅除罗荣桓文革前已逝世，其余在文革中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三位元帅（贺、林、彭）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没有任何一场战争可以使这么多高级将领先后倒下，这种情况只有苏联的大清洗时代可以媲美。为什么文革时期高级将领的折损率这么高？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军人离政治太近。

1972年8月21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及附件《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自此，参加“三支两军”的官兵陆续撤回部队，需要留地方工作的军队人员则就地转业。至此，军队“三支两军”工作结束，各地方权力重新回到文革前当权的地方官僚们手中。

“九一三事件”后，军队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军委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973年12月，邓小平恢复工作，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1月，邓更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邓、叶主持下，同年6—7月间，举行军委扩大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会议决定军队消“肿”，三年减少兵员160万，全军总人

数精简 26.2%（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 27.3%，海军精简 17%，空军精简 16.4%，各军区及直属单位精简 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 16.6%）。到 1976 年，全军总人数比 1975 年减少 13.6%，成绩不俗。正当其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起，使精简整编和整顿工作没有全部完成即被迫中断。

## 六、毛、华—陈锡联时期

本时段由 1976 年 2 月至 10 月，为期八个月。陈锡联名义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6 年 1 月，毛泽东取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权力，又决定由陈锡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继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 月 6 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以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8341 部队）部分兵力，未费一枪一弹，一举抓获“四人帮”，清除了在中央的文革极左派全部势力。我曾断言，“对于毛泽东家族而言，毛犯的最大历史错误就是让汪检讨过关，‘信任如故’，而对中国而言，中南海御林军的掌控权仍旧在汪手中，这未免不是一件幸事。毛放过了汪，汪却没有因此而感恩戴德地放过他的老婆，还有毛远新。没有汪主动，坚决的支持和参与，1976 年十月之变绝对不可能成功。”

如此说来，结束文革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也是由军队最终完成的。

## 七、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者在位时间计，文革十年，大致可分为林彪的前五年（1966 年 1 月至 1971 年 9 月）与叶剑英的后五年（1971 年 9 月至 1976 年 10 月，包括陈锡联名义上的八个月）。前五年，军队登上文化大革命政治舞台的前沿，并一度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后五年，军队从政治舞台的前沿后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极左派势力膨胀。幸亏毛泽东并没有将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权力交予极左派。1973 年，王洪文一度成为毛预设的又一接班人后，并未顺理成章地成为军委副主席。即使是极左派中最有心计的张春桥，亦只是没有军事指挥实权的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这一尚存理性的安排，使党内健康力量在 1976 年十月之变中轻易取胜，从而使中国避免了在黑暗中的继续徘徊。

（未完待续）

□ 来源：《文史讲堂》微信号

~~~~~

【拒绝遗忘】

4.22 聚会历难记

• 孙怒涛 •

## 目录

- 一、缘起文集
- 二、紧张筹备

- 三、聚会叫停
- 四、聚餐不行
- 五、合川小聚
- 六、礼堂合影
- 七、余波涟涟

## 一、缘起文集

2013年5月下旬，为编撰文集事（文集，指后来出版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我专程去了一趟北京。那十天，拜访了不少校友、朋友，参加了几次聚会，收获颇丰。北京之行是文集的启动之旅。

此后，从总体策划、顾问聘请、约稿审稿到出版发行等全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感动。要是没有数百位校友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文集是不可能做成功的。我心中暗暗立下一个心愿：如若文集最终得以出版，我一定要办个答谢会，当面向大家说声“谢谢！”

文集终于在2015年2月底出版了。

9月10日，我向70余位文集的作者、顾问、资料提供者和直接贡献者发了个邮件，做了一个前期调查：

- 1、如果举办文集聚会，您有参加的意向吗？
- 2、我在杭州，具体操办需要北京的校友出大力帮忙，您有余力帮助吗？

当天，就有20多位校友给我回复，表示有意参加聚会，其中有十几位校友愿意帮助筹办（连年届八旬的林贤光老师也表示愿意出力，令我好感动！）。

这给我很大鼓舞。我决定2016年校庆期间在北京举办一次文集聚会。

我不在北京，有谁能帮我张罗繁杂的筹办事务呢？经过底下沟通，吕述祖答应牵头组织，王嵩梅、孙毓星答应出力协办，陆元吉答应出主意想办法。就这样有了筹备组，我们几个人在9月27日建了个聚会筹备小群。

述祖、嵩梅、毓星、元吉这几位校友，因为他们对公益的热心和观点的平和，在校友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广泛的人脉。他们还都是文集的顾问和作者，对文集有巨大贡献。有他们具体筹办聚会，我对办好聚会信心大增。

## 二、紧张筹备

第一件要定的是聚会的日期。校庆日是每年4月份最后一个周日，即24日。从以往经验来看，4月22日是最适合聚会的日子，先定下来。

聚会规模，除了文集作者、顾问以外，校友能来多少人，心里没底。正式报名尚早，先在我主持的“清华校友人文茶馆群”里预报名，结果连同先前有意向参加的作者、顾问，一共有40多位。这样看来预计到时会有60人参加，属于中等规模的聚会。

离聚会还有半年多，没法做具体的筹备工作，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商量起来的。譬如，这次聚会准备搞哪些主要活动？是单纯联谊的性质还是包含一个座谈会？

就在前段时间，我与三五个校友讨论过召开清华文革研讨会的可能性。大家都希望能有这样一个研讨会，也愿意出力，但要牵头谁都有难处。我自忖我没有能力牵头筹办研讨会，但是在聚会中夹带着开个座谈会，我还是可以办到的。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关于聚会的主要活动是文革座谈会的想法得到筹备组的一致赞同。他们认为聚会既有合影、聚餐等联谊活动，又有文革反思座谈活动，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2016年正是文革爆发50周年。我们一致赞同座谈会的主题是“文革反思与清华”，商定了特邀嘉宾名单，由我联系落实。

校外的朋友，除了文集的作者、顾问外，基本不邀请。媒体，则一律不邀请。我们的原则是低调再低调，动静不要大，确保聚会成功。

在偶尔商量几句的慢节奏中，我们度过了2016年元旦，又过了猴年春节。2月22日是元宵节，离聚会正好还有两个月，我在茶馆群里贴出了文集聚会邀请函，正式向校友发出邀请：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商量，决定于4·22在北京举办聚会，时间一天，地点待定。

聚会包括合影、会餐、座谈等活动。座谈会上将有杨继绳等多位知名人士作演讲。

文集能成功出版，有赖于校友们的鼎力帮助。现向茶馆群的群友正式邀请，欢迎你们前来参加聚会，见见老知交，会会新朋友，说说开心话，谈谈家国事。

出人意料的是，报名仅三天，报名人数就突破了80人，还有多位有参加意向的。这大大突破了原先60人的预计，赶快宣布报名截止。

筹备这样大的聚会，大家有什么要求，需要征求；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出力；会有不少通知，需要及时发布。于是我在3月1日建了一个聚会专群。

聚会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找到一个能容纳八九十人的聚会场所，要求能吃饭，能开会，能合影，交通方便，经济实惠。

作为清华校友，最先想到的是母校。这里要找一个合乎条件的场所很容易，关键是校方肯不肯借。我估计难度很大。我既不想给母校添麻烦，也不想太欠人情。请在校的老师问了能否租用多功能厅？果然不行。校方刚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校内及学校相关机构的场地使用管理的通知”。对照使用条件，我们明显不符合。看来只能到校外去租用场地了。

找个合适的场所真不容易！前后考虑过十几个方案，包括去郊区度假村或校友的山庄。述祖亲临踩点的就有五六处。经过筹备组多人多次反复考察比较，最终选定位于北沙滩的亚奥酒店为聚会场所，并于3月21日签订租用合同，支付了定金。最令我们头痛的会场难题解决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后面这一个月，都是具体的筹备。在筹备小群里谋划，在聚会专群里落实。虽头绪纷杂，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准备在会场上悬挂横幅。横幅内容经过仔细推敲，定为“清华老校友2016校庆座谈会”。另制作了一条“文革反思与清华座谈会”的横幅，等聚会结束后散场前挂一会儿，有愿意者可在这条横幅下留影纪念。我就很想在这条横幅下照个相，筹备组的几位也说，我们一起来个合影。

为座谈会准备了录音笔，落实了录音整理人员。

征集到一位专职为聚会做摄影摄像的朋友。

对80岁以上的校友落实了专人接送服务。

为几位校外贵宾安排了一对一的志愿服务。

准备了胸卡、资料袋等。

有四五位校友想在会场分发赠书。我们确认所有赠书都是国内正式出版物。为安全起见，谢绝在现场赠送港版书。

刻了一枚纪念章，用于在胸卡和赠书上盖章留念。

上述的具体筹备工作，都是在聚会专群里商量落实的。可谓一声吆喝，众人响应。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也基本落实。有杨继绳等8位特邀嘉宾精心准备了讲演稿，每人约15分钟，再有5分钟与听众的互动交流。嘉宾讲演之后自由发言，有近20位校友积极申请。

为嘉宾讲演准备了PPS幻灯片。

座谈会的主持人是述祖，我和毓星协助主持。

嵩梅还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准备在杨继绳讲演后送上一束鲜花，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杨学长以敢于讲真话的精神，直面艰难危险的勇气和为几千万被饿死的同胞树碑立传的功德在校友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他荣获哈佛大学2016年路易斯·里昂奖，但未被准许出国领奖。我们以敬献鲜花的方式表达校友们对他获奖的热烈祝贺和坚定支持。

在筹备群里，我们还商量过如果来了“不速之客”怎么办？不让我们开座谈会怎么办？要强行驱赶我们怎么办？为此，我们制定了相应的预案，并要求大家保持冷静，不发生冲突。

我还考虑到了“如果我被带走怎么办”。但没提出来，怕给筹备组过大的思想压力。

有校友给我们通风报信：“最近的风声不是松而是紧。GA人员的口径是50周年搞活动就是不行！”嵩梅说：“即使面对的是不讲理的人，只要咱们不越界，会议发言不涉及当前时政，不搞什么集体签名之类的活动，让他们没有理由刁难我们。”她的话代表了这群人善良天真的想法。

校友们对聚会提了不少建议。有些我们采纳了，有些锦上添花的，有些可能会引起参会者争议的或会引来上面关注的，我们都谢绝了。一句话，自我约束，顾全大局，一切为了聚会的成功。

4月7日，我在聚会群发布了四条会前告知。其中最重要的两条是：

1、重申座谈会的主题是“文革反思与清华”，不谈与主题无关的敏感话题。发言应平和、理性。各人言论只代表本人立场，责任自负。在会上不开展争论。

2、遇到突发事件，请保持冷静，听从会务组的安排和指挥，言行切勿激动。

16日，报到须知发布在聚会群上，报到时人手一份的座谈会议程也已敲定，标志着筹办工作基本完成。述祖说，21日下午把横幅挂起来，将桌椅按我们的要求排列一下，会场就布置好了。

在婉谢了不少慕名想参会的校友和校外朋友之后，正式报名人数是102人。最后一位是黄安妮同学。她在19日从美国给我打来越洋电话，问我聚会日期是否最后确定？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会有变！她说，那我下午就登机启程了。

我也满怀着信心和期待，于20日赶到北京。

### 三、聚会叫停

20日晚，筹备组正在小群里商量事情，述祖发上来这样一条帖子：“非常不好的消息，刚接到亚奥经理的电话，说接上级紧急通知，由于治安原因，咱们的会议不能举行！”

这则信息凝固在我的手机屏幕上，好久没有更新。想必，其他几位看到这一震惊的消息，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过了几分钟，我发出一声叹息：“还是出手干预了！”

说句实话，我对有关方面要干预聚会是有点思想准备的。2014年校庆期间，有两百多位校友参加的4·25聚会虽是纯联谊性质的，尚有几名便衣在紫光厅门口转悠，以致原定参会的学校和校友会领导均未露面。今年是敏感之年，聚会中又有文革座谈会的内容，一点不干预是不太可能的，只是不知道会干预到什么程度。我在13日还对筹备组说：“有好友提醒我，北京对大型聚会特别警惕，预估我们的聚会不一定开得成。如果会场被封，坚决不让进，我们怎么办？”只因当时忙于具体筹备，没功夫继续议论。现在干预已成现实了，而且是极其严重的干预，我们怎么办？

我请述祖问问亚奥，如果在警方和宾馆的双重监督下，我们取消开会，只吃饭，合影，行不行？嵩梅说，不会同意的。果真，述祖联系后告诉我们，亚奥说与聚会有关的一切活动都不行！

我说，看来座谈会是没法举办的了，有一点我们无论如何要办到的：这么多校友从北京，从全国，从海外赶来，我们总得聚个餐，见个面，聊聊天吧。

尽管述祖的心情很不好，嵩梅已经累得上火了，我们还得商量怎么办。

到奥体公园游园去？到亚奥附近的眉州东坡占大厅位子去？到清华觅食去？到九渡河农家乐去？到郊外的圆明园去？等等。既要考虑交通又要考虑吃饭，反复比较，一个都落实不了。看看夜已深，得先给大家透点消息。

23：08，我在聚会群上发了这样一条通知：因不可抗拒的原因，聚会将有较大变动。请与会者关注明天的重要通知。

立时，“时间变吗？”“地点有变？”的帖子跟了上来。密切关注聚会的校友们的心似乎被揪了起来。没人问原因。大家心里都明白“不可抗拒的原因”来自哪里。

近0点，述祖又说：明天9点林贤光老师要来我家，说有要事，但又不便在电话里说，我想没准儿与禁会有关。

已到深夜，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先休息好。天，一时还塌不下来。但是述祖、毓星，可能还有嵩梅都得靠安眠药才能睡觉了。

早些天从美国回到北京的阎淮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聚会将被叫停的消息。他主动申请参加筹备组，说聚会到了关键时刻，多一个人就多一个主意多一份力量。他真是一位无事不惹事，遇事不躲事，出事不怕事的好校友，有胆有识见过大世面的侠义之人。

21日5：30，我就醒了。阎淮一早开车带着我赶到述祖家，此时，84岁的林老师已经在。他居然是骑着电动车赶过来报信的！林老师说，学院党委书记罕见地来到他家，问他是不是要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他要求林老师不要参加这个聚会。我们这时才确信，聚会专群、筹备小群及我和述祖的手机，都早已被监控了。事后我们知道，还有几位准备在座谈会上讲演的校友被单位领导约谈、警告、阻止，时间最早的是在4月18日。

我们这个百人老校友聚会已经引起了北京警方的严重警觉。我们在明处，他们对我们了如指掌。他们在暗处，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我们光明磊落，坦荡行事，没想到真有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算计我们。此前，这还仅仅是我们的猜想或假设。

述祖、毓星忽然想起六道口的郭林酒家，这曾是聚会场所的候选之地。只因可作为会场的宴会厅正在装修，所以就放弃了。现在只聚餐不开会了，就请述祖再联系郭林。得知虽然没有10桌的大包厢，但有两个相邻的包厢，只要把屏风移去也能摆下10桌。我们一听大喜过望，决定中午去试吃。

我和述祖、毓星等到了郭林，先察看了大包间，很满意。接下来试吃。吃完，订餐。

郭林的菜肴经济实惠，把招牌菜全都点上，一桌还不到一千元。考虑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不知道聚会的变动，就改订为9桌。联系亚奥会务用的是述祖的手机，我们多了个心眼，在郭林留的是毓星的手机。

这顿试吃，吃得舒心满意。找到了这么一个理想的聚餐场所，夫复何求？座谈会虽然开不成，但是为座谈会准备的文稿以后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在聚会群上，大家知道聚会遇到了麻烦。在帖子中，不是讽刺N个自信，就是“草木皆兵”、“百姓点灯”这样心知肚明的成语，更多的是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我们在述祖家，在郭林，一直密切关注着大家提供的信息。

等到点好菜付毕定金，我在聚会群上发布了重要通知：

因特殊原因，经筹备组郑重研究决定，原定于明日（4·22）的座谈会正式取消。正值校庆，不少校友来自外地，有的还从海外特地回校，因此，还是要见见面吃吃饭。聚餐地点：郭林家常菜六道口店。聚餐时间：4·22上午10：45（不要过早，因店家未开门）。请有文艺才能者早做准备，爱喝酒者自带酒水。

述祖也贴了帖子，特别强调：“明天是吃喝玩乐。能唱的就唱，能吹的就吹，能跳的就跳，能喝的就喝，一醉方休（自带白酒）。 ”

通知里清楚明白地写上座谈会取消，改为聚餐。这话不只是写给聚会校友看的，也是说给监视我们的有关方面听的。只要他们了解到我们预订的是吃饭的大包间而非开会的会场，就应该知道我们是真心诚意只是吃个饭，放弃开会了。我们想，我们不做让他们为难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他们高抬贵手，让我们吃顿安稳饭。我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是友善的，而不是对抗。

我们用“明码手机”（我和述祖的手机已被监听故而信息已如明码电报）通知几位外校的朋友，大声告诉他们座谈会不开了，敬请谅解。

通知贴出三五分钟后，聚会群里贴上来这样的帖子：“支持你们的决定！”“皆大欢喜！”“有什么可出车出力的事吗？”“见面就好”“明天准时到场”……。

聚餐落实，心中踏实。我们各自回去睡了个安稳午觉。

#### 四、聚餐不行

21日晚上，原定是筹备组的工作晚餐，最后检查亚奥聚会的各项准备工作，看看还有什么遗漏之处。现在改为检查郭林聚餐的准备工作，相对而言要简单多了。

一起晚餐的除了筹备组的述祖、嵩梅、元吉、阎淮外，还有几个住在附近的校友。毓星住在小汤山，路远，没有参加。

在大鸭梨烤鸭店，述祖说了聚餐的落实经过。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能做到这样已是目前最好的结果了。

说起为什么有关方面对聚会的情况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人怀疑是不是出了内鬼？我说虽然也出现过蹊跷事，内鬼不能绝对排除，但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还是不要随便怀疑校友为好。述祖说可能是有几位敏感人物集中到聚会群里来了，引起了监控方的注意。一旦被注意到了，建在公网上的微信群，无秘密可言。大家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大。

有人担心聚餐会不会又被叫停了？大家都说，哪朝哪代哪有不让吃饭的道理？要是聚餐也被叫停，太搞笑了吧。一帮古稀校友在北京城里居然不让聚个餐，这在清华百年历史上也找不到这样的先例呀！。

七嘴八舌，嬉笑调侃，大家聊得很开心。

19：21，我见坐在对面的述祖接到一个电话。他听了几句，神色凝重起来。通话毕，述祖说：刚才毓星来电话了，郭林打电话给他，因“煤气管道检修”，明天不能接待，订餐取消，还要立即退还定金。毓星对郭林说，我住得很远，明天再退吧。郭林说，再远也要在今晚把定金退还给你们，我们派人给你送去。（约21点半，郭林大堂经理驱车24公里赶到昌平小汤山将定金退还。这位经理除拿走定金收据以外还索要点菜单，因菜单在述祖手里，未被拿走。我们的订单在郭林手里似乎成了一颗必须马上甩手的烫手山芋。）



述祖说完，房间里一时间鸦雀无声，惊呆了。竟有这样即便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都没有发生的匪夷所思的事情，连饭都不让我们吃？我对于干预座谈会是有思想准备的，对不让聚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太下作啦！我非常气愤。那感觉，就像是在逃难途中被追杀，非要我们将赶尽杀绝似的！

尽管气得很，我们得面对严酷的现实：明天没地方吃饭了，怎么办？怎么办？

再与郭林交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显然他们也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毁约非他们所愿。可以想象明天的郭林必定会闭门谢客。即便开门，也会遍布便衣。我们如果再去郭林吃饭，必然会引起冲突，那时局面非我们所能控制。

有人提议回清华去。百号人的午餐怎么解决？临时被我们“运动”到校园去的校友们会有意见。要是自带干粮，一帮老头老太坐在大礼堂前的台阶上啃面包，喝凉水，其状将是何等的惨兮兮。要是去荒岛（即近春园遗址），亭子里只能坐三五十人，难道让一部分年岁不小的人站着或席地而坐吗？还有交通问题，体力问题，具体的困难太多了，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都想到都解决。

有位不是筹备组的校友认为在叫停亚奥聚会时就应该退避三舍，连聚餐都不应该再搞。我虽胆小但还不是一个碰到风险马上就缩头的人。明知前面有风险，总要试一试风险离我究竟有多远，总想尽可能地再往前走一步。

我个人可以冒点风险，但我没有任何理由把校友带入到一场现实的冲突之中，因为他们都是为叙校友之情而来参加聚会的。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我也不能让他们带着太大的失望就这样打道回府。要解这道两难的题好纠结呀！

如何找到一个次佳方案，我们急切地商量着。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林聚餐只能取消了。20：44，我不得不在聚会群里发了一条紧急通知：刚接到郭林家常菜六道口店通知：聚餐不能在郭林举行并退回订金。现决定：取消明天聚餐和校友聚会。请互相转告。

立刻，有位想必是紧盯着手机屏幕的校友发了这样一条跟帖：真是难以置信，校友连在一起吃顿饭也不成！GA做得也太绝了。

我愤慨地以拳擂桌，难受地说：我怎么对得起那些远道专程来参加聚会的校友啊？心不甘呀！

阎淮提议，明天中午不如到他常去的合川酒楼，请几位外地来的校友，小聚一下，表示一点心意。

既然全体的聚餐不行，也只能用这个办法弥补一下。小聚餐，有，聊胜于无。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吸取教训，丢掉幻想，尽可能保密。

合川酒楼比较小，最大的包厢只有2桌，每桌最多12人。除了筹备组和几位必须参加的北京校友外，将海外和外地来的校友，列出了30多人的名单，再按路程远近挑选，保留24名。每划掉一个名字，我心里就一阵难受。黄安妮是专程从美国飞来参加聚会的，只因我与她约好过几天还要再聚一次，我就把她从邀请名单中划掉了。心里说：黄安妮呀，老孙太对不起你了！可以这样说，名单上留下的校友没有不该邀请的，划掉的校友理应都该邀请

的。为了保证2桌的微型聚餐不再被破坏，我不得不“牺牲”了他们。那真的是忍痛割爱啊！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歉疚。

名单敲定后，开始一一通知。再也不敢在聚会群里发布消息了，也不敢用我和述祖的手机通知了。

我们给杨继绳是这样通知的：老杨，明天你在家等着，会有人来找你。老杨说，明白。第二天一早，当校友开着车子到了老杨家里，才告诉他中午到哪里去吃饭，接了他就走。

从多伦多来的张喜英是我通知的。我用别人的手机打通了她的电话，说：“我是孙怒涛，你听清楚是在说话吗？”“听清楚了”“明天的郭林聚餐取消！”“啊？”“新的聚餐地点我请吕述祖告诉你。”“哦”“要保密！”“明白”。简洁的对话就像是塔台与飞行员的通话。

这一刻正好被叶志江碰上了，他当时正巧与张喜英在一起谈事。他说：

大概是晚上9点多，她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几句话后便见她神色凝重起来，又紧张地在桌上的一张餐巾纸上记录着什么。这细小的动作让我觉察到她竟连找一张纸的几秒钟都不容耽搁。虽然我听不到对方的讲话，她也只有简单的应答，但我一下子就猜出了这神秘的电话一定和第二天的聚会有关，应当是聚会筹备者改用单线联系的方式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她记录的一定是新的接头地点。我自然很好奇通知的内容，也很想听她解释，但她放下电话后便匆匆离去。我猜想，对方一定在电话里关照了她不能泄露新的接头地点，所以分手时，她只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明天的聚餐活动取消了。”便带着得到组织信任的骄傲，将一脸疑惑的我留在昏暗的街头，让我去细细品味这戏剧般的地下工作情景。

我也同样感到我是在做地下工作。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的教育。《红岩》和《青春之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必读的许多红色小说中的两本。当我在2015年委托工厂偷偷地在半夜里印刷文集的时候，我就联想起，我怎么像是《红岩》里印“挺进报”的陈刚？此刻，当我用电话通知张喜英来合川聚餐的时候，我又联想起我怎么像是《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组织飞行集会？我这点“对敌斗争”的经验都是党教导我的，现在却在应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这是不是一个滑稽而又可笑的黑色幽默？我苦笑了一下，却笑不出来。

述祖、嵩梅、元吉、阎淮等尽管都很疲惫，心情也很恶劣，还是强打精神，按名单一一通知了。诸如请包罗第二天早点来酒楼占座位，请于火一早把杨继绳“劫持”到合川来这样的细节也都落实了。

已是深夜，聚会群里一直在议论纷纷，有人提出在荒岛相聚的动议。林海23：19在群里发上来一条帖子：“明天中午带一瓶酒，一袋花生豆，再整些猪耳朵鸡爪子，荒岛坐坐。”

我心中暗喜，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呀！林海牵头在荒岛小聚会，既弥补了合川聚餐人数无法再多的遗憾，也是对合川聚餐的有效掩护。我心里感激林海。

今日（此刻已是22日凌晨）会如何？身心俱疲的我们都不知道。睡觉再说。

## 五、合川小聚

起床后，忽然想起述祖曾经在前晚就提过在清华大礼堂前集合照相然后去荒岛聊天的方案。如果在合川聚餐以后把人马拉到礼堂前去合影，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我马上打电话与述祖商议，得到他的支持和肯定。于是，08：09，我在聚会群上贴了这样一个简短的帖子：“下午3点，我将在大礼堂前恭候校友们！”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懂我的意思，当我站在大礼堂的时候，一定不会孤单的。

9时许我到合川饭店，大多数校友已经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消息是，可以与隔壁的小包间打通，这样就可以摆上3桌。正好后来又来了几位不请自到的校友，坐下来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在用餐之前，我们请杨继绳讲话。老杨宣读了他为4·22座谈会特地准备的演讲稿：《为什么民间文革史学成为当代显学？》。这篇重要文章当晚就在网上流传开了。

餐厅不是会场，简陋的条件根本就不适合宣读论文。幸好毓星带来了排舞队用的耳麦和小音箱才使大家都能听到老杨带有湖北口音的声音。请杨继绳宣读反思文革的论文是个象征，宣示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意志：无论物质条件多么简陋，外部环境多么险恶，我们否定文革、反思文革的权利不容剥夺！我们坚持讲真话、不遗忘历史的决心不会动摇！

老杨宣读完毕，接下来本应向他献花。由于聚会发生变故来不及准备，改由王嵩梅、周家琮向杨学长敬献纪念照片。这是2015年校友们聚会庆贺杨学长获奖暨75寿诞的合影。当时，人在成都的周家琮特地远程预订了一个大花篮赠送给杨学长。

王普将他手书“老骥伏枥”的折扇赠送给杨学长，以表达校友们对他的敬重和钦佩！

作为文集的主编和聚会的发起人，我也讲了几句话，对为文集作出贡献的作者、顾问表示感谢！对为筹备4·22聚会付出心血的筹备组和志愿者表示感谢！对所有参会者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校友们表示热烈欢迎！之后，我一个个地向每位校友依次敬酒，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看到校友之间互相敬酒、合影、聊天，气氛热烈、友好、温馨，心里暖洋洋的。我惦记着荒岛的小聚会，不知道他们进行得怎么样了。事后知道，那里的小聚也十分成功，有近十位校友自带干粮、饮料，又吃又喝，非常开心。

不是每个来参会的校友都像在合川和荒岛的校友那么开心。有位没有微信的校友，我忘了电话通知他，他依旧如约去了亚奥。只见院子里停着一辆警车，几个警察注视着来往行人。他跑到7楼会场，只见大门紧闭。他这才意识到聚会已经取消，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还有一位校友看到郭林聚餐叫停了，第二天一早退了房，准备乘火车回家。当有人通知她下午在大礼堂还有合影时，她正拉着行李箱流落在北京街头。想着这些我未能一一通知到的校友，我心里特别难过，总觉得是我无能，让这些校友受了委屈。我心里也清楚，如果有关方面能对我们手下留情，网开一面，我们何至于如此狼狈？

## 六、礼堂合影

14点左右，合川聚餐结束，我们驱车直奔清华。

离15点还有十来分钟，礼堂西侧已经聚集着好多校友。嵩梅正在分发胸牌。挂上胸牌，就是自己人了（这是聚会前的约定）。我见到了好些在校友网和微信群上神交已久但未谋面的校友，如国屏、于火、子壮、鸿猷等等。

在三三两两亲热交谈的校友中，孙铮正拉着黄安妮的手，向她表示歉意。原来，1968年5月8日，黄安妮等三名女生（在这前后已有多名同学和干部）被团派以“十二人反党集团”的罪名，非法关押了92天，饱受折磨和凌辱。孙铮当时在“罗文李饶专案组”做记录，并没有参与“贾春旺及邢竞侯等6个学生专案组”的专案。这次，孙铮见到黄安妮，主动上前，拉着她的手，向她道歉。这几年来，两派在共同揭露真相、反思文革的基础上，团派的蒯大富、孙毓星（孙耘）、崔兆喜和四派的蒋南峰等校友，先后向对立派受过伤害的老师同学赔礼道歉。这种真诚的、上下联动的、持续不间断的道歉、赔礼和悔罪化解了受害者的心结，促进了两派的和解，使之不再停留在两派恩怨的层面，而是共同面对历史，以史为鉴，推动社会进步。

15点正，合川、荒岛和零星的“游击队”三路人马会师大礼堂前。述祖、包罗等招呼大家赶快合影，以防夜长梦多。

六七十位校友举臂欢呼。同道校友相聚在一起，感到温暖而有力量！  
合影结束，移师荒岛。

在荒岛的亭子里，大家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

当然也有自发的活动，如校友将自己的著作赠送给校友：韩文亮赠送《路》，戎月莉赠送《海棠依旧》，孙毓星替刘泉赠送《中学生学习之道》。还有崔元浩、王振先等校友的才艺表演。

有位女同学坐到我的旁边，对我说：“老孙，有人在监视我们。”我一惊，问：“谁？在哪里？”她悄悄地指给我看。那是一个坐在离我们二十米远的椅子上正在玩手机的年轻人。我不以为然地对她说：“可能是个学生吧？”“不，这个人我在大礼堂前就见过。一路走过来，我又见到他三次。”她这一说，我仔细观察了一阵，相信这是一个监视者了。他要是个正儿八经的学生，应该是看书的。可他一边玩手机偶尔瞟我们一眼始终没动窝，太不合常理了。或许，这就是当今大学里的“信息员”？我用手机给他拍了一张“工作照”，立此留存。剪裁了一下，虽模糊，轮廓是清楚的。

事后，林海写了一首诗，规劝这些迷途的孩子：

孩子，  
你做了件卑鄙的事情。  
你潜伏在微信群里，  
盯着爷爷奶奶们的一言一行。  
这些七十开外的老人，  
经历过饥馑的年代，  
经历过文革的腥风血雨，  
也曾为共和国的富强，  
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为什么在人民的国家，

会看到你这样齜齜的眼睛？  
你不是日本特务，  
不是国民党特务，  
但你毕竟是一个特务啊。  
你将如何面对  
你的父母  
你的丈夫或妻子  
面对你的孩子？  
特务——  
你的亲人将以你为耻。  
我知道你也要穿衣吃饭，  
但做人不能出卖魂灵。  
你可以去做苦力，  
你可以沿街乞讨，  
你可以去卖淫。  
他们比你高尚，  
只有你才是卑鄙的。  
孩子，醒醒！

还有几位校友因故未能参加礼堂、荒岛的合影。如福州来的刘尚希校友是因为来的路上迷了路。晚上，她专门来近春园宾馆看望我，与我攀谈了一个多小时，让我十分感动。

在聚会群里，有许多这样的帖子：“看清楚了好多！明白了好多！”“不能再幼稚了！”“原来模糊的现在清晰了，真希望不是真的。”亲身的经历，比任何说教更有力。

聚会群本来就是为聚会而临时建立的。关群之前我写了几段最后的致词：

#### 一、致叫停座谈会的决策者

我们去年就考虑想搞个文集聚会，春节后开始具体筹备。我们明白，网络无隐私可言，一切都在你们的监视之下。我们在微信群里商量讨论，因为心地坦荡。倒是你们在暗处，好像有点见不得人的样子。是的，我们座谈会的主题就是“文革反思与清华”。这错了吗？怎么现在文革研究成了禁区？“文革”成了敏感词？党中央在1981年所作的历史决议，明确宣告文革是浩劫，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以后的历届中央从没有否定过这一历史决议。我们反思文革，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恰恰是你们这些决策者，违背了中央精神，打压反思文革的活动。你们的行为，除了增添对你们的失望以外，还有什么正效果吗？习总书记以反贪腐凝聚人心，你们以打压民情涣散民心。你们这不是在与中央唱反调吗？

#### 二、致叫停聚餐的执行者

座谈会叫停了，我们虽然不满，但不想与你们发生冲突，我们改为聚餐。我们用电话通知谢绝了几位外校朋友，以保证聚餐的都是清华校友。你们监听到了吧？我们在微信群里叫大家自带酒水，准备才艺表演，你们也监听到了吧？近百名七老八十的校友，有好些是外地来的，更有几位是从海外来的，我们只是想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一顿，见见面，聊聊天。我们的聚餐还是被你们叫停了！这太不近人情了吧？哪朝哪代，连亲朋好友在一起吃饭也要被禁止？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东德士兵射杀翻越柏林墙的偷渡者。审判时，士兵辩护说是执行长官命令，应无罪。检察官说，是的，作为士兵，你必须执行命令，但你可以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你们作为执勤的网警，要吃饭，要谋生，不得不做监视、删帖、叫停等等损事儿。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良知的話，你们对我们的聚餐是可以眼睁睁闭的，你们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希望你们不要泯灭了良知，记着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 三、致受到伤害的与会者

你们很受伤，我也与你们一样受伤。我们亲历了一次为争取聚会、聚餐权利的抗争，我们失败了。这说明要民主、要自由的路将会有多漫长、多曲折。尽管如此，我们会继续走下去。我们向前多前进一米，就是替我们的子孙后代拓展了一米。这是我们这代人最后的历史责任！

我衷心感谢所有参加合川聚餐、礼堂合影、荒岛叙谈和报名参加4·22聚会的校友们！因为你们深厚绵长的同学情谊，更因为你们不怕困难、不惧风险的勇敢精神，向你们致敬！

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万岁的长寿，没有永恒的思想，没有不倒的王朝。

旧情难忘，别了！

新篇开张，再会！

### 七、余波涟漪

我们反思文革的小小聚会将被扼杀了。10天后的5月2日，带有强烈文革元素的红歌会在人民大会堂堂而皇之地登场。这一扬一抑，态度是何等地鲜明！

我于5月初回到杭州。12日上午，我接到一个自称是GA打来的电话，说要与我谈谈。要是以前，我肯定认为这是诈骗电话。此次，我明白，要来的终于来了。

电话那头问我是我到社区谈还是他们来我家？与老伴商量了一下，还是在家里谈吧，免得我被叫走，她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牵挂。

不一会儿，听见敲门声，来了三个人。两个是着便装的警官，陪着来的是着警服的社区民警。那两位警官履行手续，给我出示了工作证。我只瞄了一眼姓名及照片。后来知道，他们是国保。

网上常把被GA叫去谈话叫“喝茶”。我老伴沏了三杯龙井茶反请他们喝。对于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礼数还是要到的。

迁户口办证件，与警察也打过交道，但像这样的被“喝茶”还是头一遭。

都坐下后，我直截了当问他们找我为何事？他们反问我，你在杭州还搞不搞座谈会？

一听这话，果然是因清华校友聚会而引起。我们惊动了北京警方，但我真的没想到惊动的程度还这么大，以至于要通知杭州警方对我实施防范。我忽然感觉我们这帮老头老太们太有能量了！不，其实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能量了，是他们的“身子骨”太虚弱了，不自信。

来意既明，用不着兜圈子，我先给这几位吃了颗定心丸：我没有在杭州再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之类的打算和想法。

在交谈时，我明显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两个巨大的“不平等”。

在政治上，我大谈 81 年的“历史决议”是如何彻底否定文革的，大谈我们召开文革反思座谈会是完全符合中央决议精神的。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辩称他们是出于维稳的需要。我就是这样站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高度大谈政治正确，他们听着只能诺诺。

在权势上，看似普通的警官，代表的是国家机器。他们的“希望”就是要求，他们的“要求”就是命令。他们以“平和”的声调警告我不得再召集什么会议，要求我如去外地需向他们报告。我明白这就是他们对我划的红线，我听着也只能诺诺。

我的对外联系都已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下，包括手机、邮件、微信等等。我已无隐私可言。如果我的言行胆敢违反警方的警示，后果是明摆着的。

时值杭州正在承办举世瞩目的 G20 峰会，安保达到国家最高级。在 9 月初的关键一周，到西湖风景区的安检比登飞机还严。在约谈后的整个下半年，我有意控制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一公里，远离 G20 核心区。警方监控到的是一个表现极其本分老实的良民。我不想故意刺激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

但是，我的内心一点也不安分。我组织了网上讨论会，我牵头在校友群上发起对“炎黄春秋”事件和雷洋案的声援签名活动。该说的，该做的，还是要说要做。要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4·22 那天下午在荒岛的亭子里，有位校友开玩笑地提醒我：老孙，你可能又要被“记录在案”了。

不祥的预言果然应验，我又一次被“记录在案”。1983 年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虽“未发现什么问题”，但我仍被中组部“记录在案”。我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被监控着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现在，再多一二次记录在案，已是虱多不怕咬，随它去了。

我要回应他们的是，在我被他们记录在案的同时，清华百名老翁老妪满京城找饭馆而无处吃饭这件荒唐事也同样被我记录在这里了！

我极其渺小。在粗暴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介草民命如蝼蚁。我也有过恐惧，我战胜了它，因为我的内心有比恐惧更为强大的信念：自由、民主、正义和良知！

◇ 后记：

5 月 8 日 12：00，在临时聚会群宣布关闭的同时，讨论群鸣锣开张。被迫流产的 4·22 座谈会移师到网上开起了讨论会。在 50 天的时间里，深入讨论了讲演稿、发言稿共 22 篇，取得了比会场座谈会更好的实际效果。此事被校友们美称为“清华文革反思 50 天”。

2016·7 初稿，2017·4 修订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

【劫后反思】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 刘索拉 •

◇ 无耻带来解放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于是，她在家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八一八”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他妈的”，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你妈的——你他妈的——你他妈的蛋——你他妈的混蛋——滚你妈了个蛋——你他妈的王八蛋！——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你妈——BI——！”拉拉跟着学，只说了“你妈”，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你妈——你妈——你妈——BI——I——。”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八一八”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他妈的”练起，一直练到“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操”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你妈BI”，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四四派”头头，原北京25中66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文革”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你妈BI”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操”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无形的禁锢”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们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祖国的花朵”的感受。

#### ◇ 粗口与小资情调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开刀，揭批的重点就是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

最常见的小资情调是多愁善感、温情主义。当年好多中学生为此做检讨，尤以女生为最。北京女八中的马笑冬就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这种逻辑早就存在了。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1951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而沉痛万分。

1952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文革”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当他率领“西城纠察队”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1953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1980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我”反思道：“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循着“工农化”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工农化”。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思想革命化”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娇娇”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1964年7月31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49年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四清”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革命虫”。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4月8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文革”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请”“谢谢”挂在嘴边。

〔作者简介：刘索拉，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1983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发表代表作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1988年后旅居英国，现定居纽约。〕

□ 原载《南方周末》2016—01—06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